房子

星南

“房子，要有阳光和开阔的视野。不仅仅是你居住的地方，还是你的未来。”

我面前的墙上有一个洞：一扇差不多刚好能装下我的窗户。它在黄昏时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倩影，现代的方形蓝色高层建筑从新规划的街区上拔地而起，在棕榈树成荫的街道上，人们穿过人行道，像池塘浮渣中的蝌蚪一样绕过一处又一处霓虹灯。他们有些人手里提着公文包，有些提着新鲜的西瓜和桃子。一辆辆出租车停在了他们身旁，为那些不想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服务。

他们中没人知道我们是谁，也没人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眨了眨干涩的双眼，转头问李洋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

“房子，未来。”

我告诉他，这是我刚毕业的时候一个朋友和我说的。

他躺在床上，身下铺着一条白浴巾，为的是让自己正专注于打游戏而不停出汗的身体不弄湿床单。尽管有着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他脸色依然不好。

他放下手中的鼠标，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找点事儿干。”

“太热了，什么都干不了。”我说着，从窗口回到床上。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现在，我是说生活上的。”

今年春天，李洋和我从上海搬到了这座城市。没多久，他就在当地的教育机构找到了一份数学老师的工作——他从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尽管他对讲课教书没什么兴趣，但做这行薪水很可观。李洋的口才很好，学历非常漂亮，而且，在他第一次授课之后他就和我说，老师在这里缺口很大。

上周这份工作出现了一些变故，他们不再允许学生们周中上课了。从那之后，李洋的生活不再充实，他陷入到了某种危机当中，他对于生活明确的目标性，他的自信心，几乎都变得模糊起来。他不断地，痴迷地玩电脑游戏。我确信他很厌恶自己现在的状态，厌恶自己正在遭受的一切。

“我变胖了。”我说。我从自己裸露的腹部抓起两把肉。

李洋抬头看了我一眼，撇撇嘴。

“零食吃太多了。”他想了想。“还总喝酒。”

“也许该去游泳了。”

我尽我所能地呼吸，用力地喘气，然后躺在地毯上做了几个仰卧起坐。他不再看我了。

这是我们在这座城市里租的第三套房子。我们在自如的app上寻找那些装修精良的，正在出租的公寓，用心地扒拉每张房源的照片。看着那些被展示的照片，我幻想自己身处其中触碰那些家具物件儿时的感觉，幻想房间里是什么味道，阳光会从哪个角度打在身上——这是对照片构图的解读，对灯光投射出的代码的感知。我谨慎选择，并坚信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即使只是短暂的未来）。我重视这一切，在与那些带我们看房子的“管家”打交道时也更容易发火。我讨厌这些人，称他们为骗子，我问李洋明不明白我是怎么想的，他说他不明白。

一个月前，我们开始一起上阿四的塔罗牌课，阿四是当地一名还未满三十岁的男同性恋者，他会组织活动，有很多朋友，一个稳定的交际圈子。李洋告诉我，每座城市都有这样的人，这是他们的能力。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告诉他我们最近在找房子，用自如。

我当时很愤怒，但极力保持平静。我说自如这样的租房公司，这样的产业，正在掏空这座城市。一代居民，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公寓，从那个年代的爆炸性经济增长中积累了财富。他们拥有了房子，既没有住在里面，也没有卖给别人，他们逃离了这里，把房子交给第三方平台。但当经济下行，承担这一切的是没有从那个时代获益的年轻人。他们被迫承受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税，附加值，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被迫离开大城市，离开那些有自如业务的城市。

而且尽管有第三方的服务，尽管我们精挑细选，最后住进这间公寓依然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对我而言，它是某种海绵状的，濒临破碎的生物，它根本不宜居住，这种感觉渐渐支配了我，让我觉得这些产业，这些人都是蛀虫。他们透过那几层海绵板，那些我们入住第二周才发现的隔断侵蚀着我，侵蚀着我的生活。我向负责此事的人反应，他们表示隔壁的人不会住很久，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不是问题。

李洋和我争论，直接争论。隔板那头的哭声，争吵声，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倾向于暴力，并且对此忧心忡忡。我们听不懂他们讲的方言，他们的口音，在刺耳的争吵和尖叫声中扭曲变形。李洋认为我过于敏感，争吵是因为不快乐——他们不会住很久——很可能是因为贫穷，付不起房租。考虑到这个国家目前的失业率和经济的惨淡程度，这个无法回避的可悲现实，因为没有工作而每日争吵是最合理的解释。尤其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强调，让我想想自己的失业史和对房租的恐惧。

李洋说，预期用暴力这样的偏执幻想来掩盖一些事实，一些和贫穷相关的不体面的事实，是很可悲的。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留意着，留意着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撞到墙上的声音。每一天，我都准备破门而入，去解决这些问题，去将这些问题驱逐出我们的生活和身体。

但如果我是一个人，当我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避免去思考这些，我祈祷他们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我跪着，上半身爬到床上，用手指去挠李洋的脚底板。他忍受着，因为热，或者单纯的不想理我。我抓起靠枕，把它猛地拉向我。我把它放在地毯上，放在窗边。

“我想在这里睡，我想吹风。”我说。

“这样不舒服。”他说。

“无所谓。”我说。

然后他谈到蚊子。

纱窗不会挡住所有蚊子，总会有一些溜进来的。

“蚊子只咬我，不咬你。我不在意，我就是想吹风。”

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稀薄了。警报器和重型摩托的声音在房间外建筑物的墙壁上四处弹射。我的目光锁定在卧室桌子上的一个媚俗的物体上，一只塑料制的粉色小猪，他的尾巴翘起来，用来挂眼镜或者钥匙之类的东西。有那么一刻，我想把它从窗户扔出去。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情绪一直积压在我的脑袋里，让这块圆滚滚的东西又湿又重的好像一块石头。

李洋躺在床上，它融进了这个房间，一切都变得白茫茫的。他和我说话时，我看着他的屁股，我们过去有一套很好的处理彼此的欲望和需求的方法。

但现在不同了，我看着我的肚子，看着我的手指在上面留下的斑驳图案。我往下，看着我的脚。一对脏兮兮、起皮，长茧的脚。我有一副有男子气概的身体，但只是男人的一部分，边角料，像是从一个完整的男性躯体中脱落下来的。

下午，在天气还没热到没法出门之前，李洋会在离家不远的连锁餐厅和八五见面。他们往往坐在一个靠近卫生间的位置，因为只有那里会有插座。那里周围围着一圈玻璃，空间狭窄。我加入过他们两次，但我不喜欢他们在一起时说话的语气和讨论的话题。

八五是阿四的塔罗牌课上的另一名学生，也是圈子里的一员。几周前，阿四向我们介绍了彼此。他来自东北，牙齿整齐，笑起来很友善。当我问他他来自东北哪里时，他说绥化，但他通常都会说“一个离哈尔滨很近的小城市”。一个很傻逼的地方，他说。不通车，没有公共交通，一年有8个月都是冬天。出生在这里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永远呆在这里，直到死去，要么出去了然后再也别回来。他选择了后者，因为留在那里的人大部分人初中都没毕业。23岁时，八五的父亲死于肠癌，他母亲改嫁了。然后他换了很多份工作，最后流浪到了这座城市。

八五觉得他能唱歌，因为他爸以前唱歌很好。他爸什么乐器都会，书法也会，但是就是不会上班。于是他也不想上班，他受不了和办公室里的人打交道。他在城里的酒吧街卖唱了几个月，那种露天的，有人给你伴奏的。一天，他在那条街上遇到了七三——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刚满二十九岁的健身教练，当时他刚刚考了证，辞了公务员的工作。他们一拍即合，在七三家的房子里度过了一个星期，用八五的话说，“整天做爱，像他妈的猪一样”。他说这话时语气自嘲又得意，我想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情况很罕见，很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次。

那之后他就在七三的家里住了下来，准确来说，七三的父母留给他的房子。和李洋一样，八五在另一家教育机构找到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

关于胜任这份工作的秘诀是什么，他这样解释。

“学历高，不要脸就行了。”

那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与八五的老家相聚几千公里，他将那些痛苦和悲伤的东西摊开来当作笑料给我们看。每分享一次，他心中的疼痛似乎都缓解了一分。那些出现在午夜梦魇中的可能性，通往另一个完全不一样人生的可能性，是否都随着分享而被他消化，被他理解，被他克服。那些被孤立和不被容纳的往事，乡愁，以及对这座城市，对他已经厌倦的爱人的怨恨，是否都已经被原谅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在那圈半开口的玻璃中，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感觉他几乎洞穿了我的头骨。他穿透了守护着我所有秘密的伪装，看到了生活在那里的那个畏缩的我。他的解释，对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解释明显过剩，一整串完整的人生经历、情绪、苦难，还有故事。但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解释过什么。当他们，当李洋，八五，七三，都在我面前问我，我为什么要在这座城市生活时，我的回答是，我还在寻找和验证一些东西。

李洋出门之后，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乘电梯下楼，前往我最近常去的那家健身房。我骑着单车，在一座桥上骑行。这附近正在施工，总有卡车，油车或者其他的巨大的车辆驶过，每次我和李洋从这里经过时我都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被车撞到，掉进河里。

不会被发表。 羞辱人。

蒂娜出去后，我乘电梯下到大堂，出发前往河花园——一个横跨城市北部的巨大干涸河床。大约十年前，这条河改道了，玛塔在一对一的语言课上告诉我，因为它很容易发生洪水。作为政府授予该市的巨额“改造鞋面”基金的一部分，干涸的河床被改造成郁郁葱葱的花园，遍布咖啡馆、网球场和足球场、喷泉和果园，最终——它的嘴与海——在一个宏伟的、新未来主义的欧洲文化博物馆。

但是——我从 Marta 那里了解到——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都是骗子，参与了与各种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后门交易。作为“Re-Vamp”的一部分，博物馆的主要建筑师同时在城市郊区建造了一座新医院，当时据称是为了贫困社区的利益。然后，一系列调查报告显示，建筑师和他的同谋正在利用这家医院从大量不正当的资金中榨取奶油。这些启示恰逢上次全球市场大崩盘，*砰！*——我记得玛塔拍了拍她的办公桌——整个“改造鞋面”项目，以及整个城市，*死胡同*，她说，大概是从萨沙那里借来的那句话。

河花园即将完工，但欧洲文化博物馆空无一人，一个超白的圆顶外壳在岸边慢慢腐烂，就像一些搁浅的外星海洋生物的巨大尸体。这位曾被誉为国宝的建筑师现在在这个国家很少被提及，而他的名字却连着一串脏话。

我沿着我们现在的建筑外面的林荫大道走，穿过老城区的郊区，穿过一个巨大的炮塔门：这座城市的 16 世纪城墙的遗迹。我找到了我最喜欢的长凳，整齐地聚集在两棵棕榈树的阴影中，在河花园墙旁边——从这里可以看到下面花园里的网球场。

按计划，一群十六或十七岁的男孩跑上球场。他们由马蒂亚斯领导。他穿着运动服，胸前印着豹子的脸，这是该市市政体育中心的标志。他的头刚剃光，与他僵硬的前臂和小腿上厚厚的头发毛毯相映成趣。这群人的集体兴奋如潮水般冲击着我。他们精力充沛，紧张不安，互相大笑和推搡，等待马蒂亚斯的指示。我似乎从他们的能量中吸取了一些东西，一种唤醒我的燃料，让我感到警觉和持续。

马蒂亚斯吹响了哨子。所有男孩都排成一列。他一次指着两个男孩，轻弹手腕，然后他们就到了球场上。当他们开始网球比赛时，马蒂亚斯从一个边线转移到另一个边线，蹲着让他的眼睛对准网，用我不懂的语言咆哮命令、鼓励和批评。他的动作像机器一样，精确而有分量，在球场上穿梭，仿佛在跟随一张无形的地图，只有他有身体和心理智能来导航。我发现他的存在同样令人恐惧和安慰。

一些男孩的动作灵活、流畅且优雅。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以锯齿状的角度移动他们的手臂，提供跛行的发球和回击，他们通过将自己推向球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球拍的运动。他们变得沮丧或尴尬，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身体拉入直觉的、严格的运动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作为男孩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

现在，马蒂亚斯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中一个身上。一个穿着不合身、破旧的运动服的男孩——一个不合身的人？——这揭示了他健壮体格的轮廓。他正在尝试发球，但球要么击中了网，要么没有完全到达网。当他的对手轮流嘲笑和责备他时，他出现在眼泪的风口浪尖。相邻球场上的一些男孩甚至停止比赛观看和嘲笑。

马蒂亚斯走近他，我短暂地作呕。我想我什至可能会呕吐，突然意识到马蒂亚斯的年龄、权威和肌肉在这种情况下赋予他的力量：他可以完全彻底地粉碎这个男孩，给他灌输一些终生的创伤或永久地扭曲他的性格，所有这些一个不诚实的批评或责备。

马蒂亚斯首先将手掌举到男孩的对手面前，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他到达男孩身边，将手指放在他的服务臂手腕上，另一只手滑过他的腰部，在他身后移动并重叠。男孩一开始还不确定，表情严峻。但马蒂亚斯把他抱得更紧了，拉他，让他们开始形成一个奇异的形状，男孩慢慢放松了。马蒂亚斯通过发球的动作引导男孩的手臂和身体，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他们全神贯注于这种温和、轻松的模仿行为，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同时性行为。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鬼魂发球时，男孩微笑着，以一种平静、起伏的动作，让我想起水草在柔软的水流中移动。

马蒂亚斯走开。男孩将球高过头顶，并发出了一个称职的发球——一时让他的对手吃惊，尽管他设法回了一个尴尬的吊球，但还是赢得了这一分。

但是没有人再看。所有其他男孩都回到了他们的游戏中。

马蒂亚斯跑去捡球，球滚到了我坐的板凳正下方和对面的网状围栏上。当他捡起它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有那么一刻，似乎正对着我——我觉得自己脸红了。

不能这样极端。

阿四 组织活动 这是他的能力。我讨厌

我不喜欢阿四， 这不公平。 他不诚心待人。 利用每个人 获得快乐。

学习塔罗牌 不能帮我找到工作，